

陇上学人文存

柯 杨 卷

柯 杨 著 马步升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陇上学人文存. 柯杨卷 / 范鹏总主编; 柯杨著;
马步升编选.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226-04794-1

I. ①陇… II. ①范… ②柯… ③马…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民俗学—文集 IV. ①C53②K89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 124874 号

出 版 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马 强

封面设计: 王林强

陇上学人文存·柯杨卷

范鹏 总主编

柯杨 著 马步升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12.375 插页 7 字数 310 千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978-7-226-04794-1 定价: 60.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印厂联系)



《陇上学人文存》第一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陆 浩	刘伟平		
主 任：	励小捷	咸 辉		
副 主 任：	张建昌	张瑞民	范 鹏	
委 员：	张余胜	吉西平	魏胜文	高志凌
	张 炯	安文华	马廷旭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珽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 主 编：范 鹏
副总主编：魏胜文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二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三运	刘伟平		
主任:	连辑	咸辉		
副主任:	张建昌	张瑞民	范鹏	
委员:	张余胜	吉西平	魏胜文	高志凌
	张炯	安文华	马廷旭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珽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主编: 范鹏
副总主编: 魏胜文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三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三运	刘伟平		
主 任：	连 辑	张广智		
副 主 任：	张建昌	范 鹏	马成洋	
委 员：	管钰年	吉西平	王福生	陈双梅
	朱智文	安文华	刘进军	马廷旭
	张亚杰	李树军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珽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 主 编：范 鹏

副总主编：王福生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四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三运	刘伟平		
主任:	连 辑	夏红民		
副主任:	张建昌	范 鹏	高志凌	
委 员:	管钰年	吉西平	王福生	陈双梅
	朱智文	安文华	刘进军	马廷旭
	张亚杰	李树军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珪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 主 编: 范 鹏
副总主编: 王福生 马廷旭

总 序



陇者甘肃，历史悠久，文化醇厚。陇上学人，或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学者，或外来而其学术成就多产于甘肃者。学人是学术活动的主体，就《陇上学人文存》（以下简称《文存》）的选编范围而言，我们这里所说的学术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存》精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甘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的代表性著作，每人辑为一卷，或标时代之识，或为学问之精，或开风气之先，或补学科之白，均编者以为足以存当代而传后世之作。《文存》力求以此丛集荟萃的方式，全面立体地展示新中国为甘肃学术文化发展提供的良好环境和陇上学人不负新时代期望而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的新贡献，也力求呈现陇上学人所接续的先秦以来颇具地域特色的学根文脉。

陇原乃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人文学脉悠远隆盛，纯朴百姓崇文达理，文化氛围日渐浓厚，学术土壤积久而沃，在科学文化特别是人文学术领域的探索可远溯至伏羲时代，大地湾文化遗存、举世无双的甘肃彩陶、陇东早期周文化对农耕文明的贡献、秦先祖扫六合以统一中国，奠定了甘肃在中国文化史上始源性和奠基性的重要地位；汉唐盛世，甘肃作为中西交通的要道，内承中华主体文化熏陶，外接经中亚而来的异域文明，风云际会，相摩相荡，得天独厚而人才辈出，学术思想繁荣发达，为中华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以来，甘肃相对于逐渐开放的东南沿海而言成为偏远之地，反而少受战乱影响，学术得以继续繁荣。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大



后方，接纳了不少内地著名学府和学者，使陇上学术空前活跃。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更是为国家民族的新生而欢欣鼓舞，全力投入到祖国新的学术事业之中，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涌现出众多知名专家，在历史、文献、文学、民族、考古、美学、宗教等领域的研究均居全国前列，影响广泛而深远。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几次对当代学术具有重大影响的争鸣，不仅都有甘肃学者的声音，而且在美学三大学派（客观派、主观派、关系派）、史学“五朵金花”（史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重点研究的历史分期、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等五个方面的重点问题）等领域，陇上学人成为十分引人注目的代表性人物。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学者更是如鱼得水，继承并发扬了关陇学人既注重学理求索又崇尚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形成了甘肃学者新的风范。宋代西北学者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乃中华学人贯通古今、一脉相承的文化使命，其本质正是发源于陇原的《易》之生生不已的刚健精神，《文存》乃此一精神在现代陇上得到了大力弘扬与传承的最佳证明。

《文存》启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之际，在选择入编对象时，我们首先注重了两个代表性：一是代表性的学者，二是代表性的成果，欲以此构成一部个案式的甘肃当代学术史，亦以此传先贤学术命脉，为后进立治学标杆。此议为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首倡，随之得到政界主要领导、学界精英与社会各界广泛认同与政府大力支持，此宏愿因此而得以付诸实施。

为保证选编的权威性，编委会专门成立了由十几位省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著名学者组成的专家指导委员会，并通过召开专题会议研讨、发放推荐表格和学术机构、个人举荐等多种方式确定入选者。为使读者对作者的学术成就、治学特色和重要贡献有比较准确和全面的了解，在出版社选配业务精良的责任编辑的同时，编委会为每一卷配备了一位学术编辑，负责选编并撰写前言。由于我院已经完成《甘肃省志·社会科学志》（古代至 1990 年卷，1990 至

2000年卷)的编辑出版工作,为《文存》的选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基本依据,加之同行专家对这一时期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研究,使《文存》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同期内甘肃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状况。

我们的愿望是坚持十年,《文存》年出十卷,到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达至百卷规模。若经努力此百卷终能完整问世,则从1949—2009年六十年间陇上学人以“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献身学术、追求真理的轨迹和脉络或可大体清晰。如此长卷宏图实为新中国60年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全部成果的一个缩影,亦为此期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业绩的一次全面检阅,堪作后辈学者学习先贤的范本,是陇上学人献给祖国母亲的一份厚礼。此一理想若能实现,百卷巨著蔚为大观,《文存》和它所承载的学术精神必可存于当代,传之后世,陇上学人和学术亦可因此而无愧于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并有所报于生养我们的醇厚故土。

因我们眼界和学术水平的局限,选编过程中必定会出现未曾意料的问题,我们衷心期望读者能够及时教正,以使《文存》的后续选编工作日臻完善。

是为序。

2009年12月26日

编选前言

我的民俗学道路

柯 杨

早在我的少年时代,就对民间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出生在西北高原的重镇兰州市,从小看惯了黄河上转动的水车,漂浮的筏子,听惯了兰州鼓子和花儿的演唱。五泉山“四月八”的庙会,正月里的社火,震撼人心的太平鼓,香辣可口的牛肉面,都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我1954年就读于兰州大学中文系时,曹觉民、匡扶两位教授的民间文学课程,又成为我的最爱。两位学者的授课,把我对民间文学的感性热爱初步提升到了理性认知的高度,为我终生从事民间文学的研究打下了思想基础。因此,当我1958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时,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民间文学作为自己的教学和科研方向。当时有人议论说:“柯杨不去研究古典文学,却搞什么民间文学研究,太可惜了。”我的回答是:“既然曹雪芹的一部小说——《红楼梦》有那么多专家去研究,为什么千百万人创作和热爱的、浩如烟海的口头文学就不该有人研究呢?”在当时,民间文学在高校普遍不受重视,长期处于被贬低、被排斥的地位。直到现在,它在许多高校仍然排不上座次,有的干脆不开这门课,有的只是作为选修课来讲授。“文化大革命”十年,我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所受到的破坏是空前的,处于树矮株弱的民间文学所遭受的打击则更为严重。1978年10月,正处于全国清算“四人帮”的罪行、拨乱反正的高潮时



期,为了重振民族民间文学事业,由西北民族学院承办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教材编写及学术讨论会”在兰州召开,有100多位专家、学者到会,其中有钟敬文、黄铁、田兵、韦其麟、陶立璠、兰鸿恩、任钦道尔吉、杨亮才、陈国强、胡振华等。这是“文化大革命”后首次全国民族民间文学界的大聚会,说它是一次重振民族民间文学专业的动员大会或誓师大会,也不为过。会议期间,我请钟敬文教授专程到兰州大学,给中文系全体师生作了题为《为孟姜女冤案平反》的学术报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是我第一次与钟先生的近距离接触,由于我在钟老讲演时帮他写了两个小时的板书,没有出现什么错误,也给钟老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成为他第二年同意我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并参与《民间文学概论》编写工作的重要契机。

1979年在北师大进修和编写教材的这一年,是我的知识和学术思想突飞猛进的一年。二十多位来自全国高校的民间文学教师聚集在钟老身边,聆听他的授课,的确是如沐春风。从书稿大纲的讨论、各章节内容的确定、每个人的分工和初稿完成后的多次修改,钟老都亲自参与,一一指导。我们的学术视野在他的教诲下得以拓展,知识得以深化,研究方法得以改进,事业心也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先生的言传身教,使我们受益匪浅。正如当年潘光旦教授替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所写的《大学一解》中所言:“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我在北师大跟随钟老“从游”的一年,深得“濡染”之益,主要收获有四:一是明白了把民间文学纳入民俗学学科体系的科学性和必要性;二是真正理解了“兴趣是成功的一半”的道理,而兴趣的巩固和强化,则必须实现从“粗识”到“真知”的转变,亦即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三是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专家、学者,原来所谓专家、学者,都是始终在人类未知领域里探索的人,我们只

要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在某个未知的领域里有所发明、有所前进,那我们的劳动就是有价值的;四是对多种学科知识与方法的综合运用,使其发挥优势互补的功能,有了更深入的体会。在北师大编写教材期间,我们曾利用一个星期天,簇拥着钟老登了一回长城。那天先生兴致极高,归来后填《水调歌头》词一首,分发给大家,其辞曰:“久蓄再来愿,今日出居庸。峻岭崇岗争翠,林木正葱茏。九折砥平驰道,千尺山头遗堞,游客尽西东。群向高台望,入眼叹神功。思前游,身已老,志犹雄。拄杖望京石上,云野豁心胸。落落眼前诸子,烨烨垦荒事业,相勉在奇功。俯仰先民迹,肺腑绚长虹。”在读了钟师大作后,我在激动之余,也写了下面这首《水调歌头》以表达自己的心愿:“我本陇头客,久盼到雄关。风云万里兴会,师友尽欢颜。雾锁葱茏燕岭,情注蜿蜒故垒,身在画图间。更喜随藜杖,评点此江山。望京阙,心如海,起波澜。壮丽青春仍在,跨马好扬鞭。幸有峥嵘巨擘,砥砺莘莘学子,发奋苦登攀。放眼神州路,千载数今宽!”北师大教材编写工作结束之后,我返回兰州大学继续任教,并把开设《中国民俗学》、《花儿研究》等新课和进一步强化田野作业作为我努力的方向。

我的民俗学课程虽然是中文系高年级的选修课,但却很受学生们的欢迎,选修的人数每年都是最多的,其原因有二:一是我的课程内容丰富、重点突出,教学方法生动活泼,理论联系实际,能与学生们家乡的民俗事象紧紧挂钩,把他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民俗文化现象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加以分析,使他们产生了亲切感和“原来如此”的顿悟感。二是每年授课结束后,必须要挑选十名左右、最喜欢这门课程的学生跟随我深入农村、山区,进行一个多月的田野作业——亦即教学实习,并让他们以调研材料或思考的问题为基础,认真写作,作为毕业论文,评定出成绩。

我一贯认为,一个从事民俗研究的学者,不但应当把田野作业看



作是最重要的学术环节,还应当有自己的“根据地”,即自己特别钟情的、值得反复调研、长期观察其民俗文化演变的一方热土。正如我在《诗与歌的狂欢节》一书的自序中所说:“只靠兴趣和爱好是不行的,仅凭一两次走马观花的采风也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全身心地投入,需要吃苦,需要十数次、数十次地去感受、采访、记录、询问,直到弄清一个个问题的关键所在。它是动态的、不断变异的民间文化,只是坐在书斋里凭二、三手材料去做静态的、凝固的研究,往往会丧失许多生动有趣的内容,甚至得出并不准确的结论。”我自己的“根据地”就是甘肃省境内的“花儿”流传地区,即以莲花山、松鸣岩、二郎山三大花儿会场为中心的十几个县。在近五十年漫长的岁月里,我不但率领本科生和研究生深入这一地区的各个乡镇、山村,对花儿歌手、花儿会和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进行反复调研,而且陪同国内外专家学者进行过十多次深层次的专题考查。我们住在农民家,与民间歌手和艺人交朋友,倾听他们的歌唱,感受他们的日常生活,了解他们的家世,探寻他们口头诗歌创作的奥秘,经历了由表层到深层、由感性到理性的漫长认知过程,真正实现了由“粗识”到“真知”的思想飞跃。这种“下定决心掘深井,不见清水不停歇”的劲头,对有志于民俗研究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我自信,经过五十年的努力,对花儿这宗大西北多民族的民间口头诗歌遗产,是有充分的发言权的。另外,我也带领学生们多次到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一带对绿洲民俗文化进行调研。诗曰:“师生联袂赴长廊,艰苦同经乐同尝。农户深谈知底细,雄关远眺意飞扬。祁连月映千年雪,朔漠沙鸣万里墙。又是一年杨柳绿,故人春色两难忘。”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六年,是我国社会大变革、大进步的三十六年,民俗文化的研究也因之跨入空前繁荣的时期。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和应用性研究的大面积开拓,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是缺一不

可的。当前民俗学界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对应用的研究重视不够。面对社会全面转型的形势,学术界在研究宗旨与方法上,也都面临着转型的挑战与考验。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人的学术研究心态,始终是存在着矛盾的,“文章乃经国之大业”(即与现实需求相联系的应用研究)的觉世观,与“文章乃不朽之盛事”(即纯学术、纯理论的研究)的传世观之间,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人物的头脑里,总是在冲撞着、抵触着,甚至在同一人身上,也往往有“彼一时也,此一时也”的不同表现。我个人认为,这两者各有其价值,不能片面地是丹非素,扬此抑彼。只是在当前社会急剧转型的条件下,为了能使传统民俗文化有一个大规模、多层次的良性转化,需要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并参与应用性的研究。这种研究,既要求学术视野和价值取向的拓展,也要求学者们走出书斋、走向社会,与各行各业建立广泛的联系,当顾问,当参谋,出点子,搞设计,把自己的知识与才能奉献给社会。因此,近十多年来,我在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和产业化以及民俗文化作为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规划、利用、设计等环节上如何秉持科学性、合理性等方面,也参与了大量调研,写了一批文章,还在国家级、省级的相关会议上以民俗学者的身份参与了讨论、建言和决策,使自己的知识能对社会的发展和事业的兴旺有所裨益,尤其是在既有利于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又有利于各地民众的脱贫致富方面,动了一些脑子,有了一些实际的进展。所以说,民俗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应当是“车走车路,马走马路”,各行其是,发挥一种互补的作用,而不应当相互排斥。

我已经退休十多年了,但我的民俗文化研究工作并没有停步。为了充分了解学术研究的动态和发展趋势,使自己的学术见解能尽量保持在本学科学术研究的前沿,我学会了电脑操作,不但可以用Word写文章,还可以畅游网页,吸收其他学者的真知灼见来丰富自



己、提高自己。回顾我从事民俗教学与文化事业的五十年,可以用热爱者、探索者、守望者这三个词组来概括。“古稀已过续长征,虽退难休另有情。常效书生能报国,不停奉献度余生。”我愿以这首诗来表达自己对所热爱的民俗学事业的心愿。

2014年3月10日于兰州大学柏斋寓所